

在日益專業化、細緻化的學術潮流中，本刊一直堅持以多元開放的心態，尋找具有現實感的公共話題。首欄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及最尾也最小的「三邊互動」欄目，就是這樣的論壇。應該承認，這是一種頗為困難的堅持。我們之所以能堅持做下去，也正有賴於各地學者及朋友的關心並參與討論。以下四位讀者對本刊8月號四篇文章的點評，短小而不失慧見。

——編者

### 經濟規模擴大未必安全

王建在〈從全球戰略視角看中國當前的宏觀緊縮〉一文認為：「中國的經濟規模每擴大一分，就可以增加一分安全保障」，但我認為經濟規模的擴大對中國來說恰是把鋒利的雙刃劍，既可提高中國的世界地位，也會惡化中國的戰略安全和經濟安全。

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：一是GDP的高速增長；二是佔世界貿易總量的增長，2001年世界貿易排名上升到了第六位；三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資源消耗大國。但是，應該看到2003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佔了GDP總額的61%左右之巨，而支撐對外貿易的主要因素是出口加工，這將帶來戰略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隱患。一旦中國與西方（包括美、歐、日）發生高強度衝突，西方是有足夠能力放棄與中國的貿易的。因為她們從中國得到的主要是利潤和廉價商

#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品，這種貿易並不佔她們經濟總量的高比例；但對中國來說，則將不僅因失去資本、利潤、GDP而導致經濟崩潰，更致命的是將失去巨量就業崗位，從而引起國內社會矛盾的大爆發。

所謂經濟安全隱患，是指相較於對外貿易增長，中國國內貿易日漸降低，國內貧富分化日益導致國內市場萎縮，走上了一條加工型的依附道路。這樣，從資源供應到貿易制裁幾乎有無數渠道可以被卡住脖子，使中國經濟日益陷在經常的威脅和危機境地。

可見，中國的經濟不是不需要緊縮的問題，而是如何緊縮的問題。從安全的角度說，除了進行政治改革外，解決中國經濟長遠利益的關鍵是兩個方面：一是擴大國內市場，增加國內貿易在GDP中的比例，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增加國民福利和收入，徹底放棄貧富分化的道路；二是加強產品的研發、製造、服務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，提高對外貿易利潤，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科技進步、教育進步和扶植私人資本的發展。遺憾的是，中國的政治現狀導致了宏觀緊縮的實際打擊對象，竟然是應該大力扶

植的國內私人資本，所謂「鐵本」事件即是。

顧則徐 上海

2004.9.1

### 唯有制度性民主才能防止制度性越軌

劉遵義在〈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展望〉一文中提到，他支持中國先做兩件事情：第一是政企分開，第二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官員的薪酬，吸引素質好的人。對此，筆者非常贊同，並認為兩者相依相存，有內在的聯繫。如果政府和企業不分開，則政府官員受到來自企業的利益驅動太強烈，遠大於薪酬的激勵，即使素質好的人，也難免精神遭到腐蝕，成為壞制度的犧牲品。

但是，政府提倡「政企分開」由來已久，迄今卻仍「難分難捨」，歸根到底，又不得不把政府角色這個話題老調重彈，否則怎樣釐清政府與企業／市場之間的關係？毋庸置疑，政府是公民／消費者／企業／市場的「服務者」或「守夜人」。那麼，是誰、又怎樣提醒政府不得僭越企業的界域？

歷史經驗表明，唯有民主

的政府才能防止越軌，唯有制度性民主才能防止制度性越軌。要點在於，引入合法性因素作為政治／行政的外在監督，強化公民的政治參與在政府中的影響，確立公民的知情權，規定聽證制度，促使公民選舉權的到位，提升信訪的地位，完善司法等等，都是增進合法性因素的一部分。

當公民可以對政府「發話」時，政府和企業分開就指日可待了。如果公民沒有合法性的否決權，恐怕政府和企業的膠着狀態還會持續，或者表面脫鉤，暗中勾結。在政府官員的遴選和考評中，增加公民的合法性支持與否定因素，不僅可以減少政治管理者的腐敗，維持管理者的素質和管理的水平，還可以培養政府官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。

聶露 北京  
2004.9.4

## 西學東漸以後發生了甚麼？

1997年以來，金觀濤、劉青峰先後對從「經世」到「經濟」、從「群」到「社會」—「社會主義」、「天理」—「公理」—「真理」、「權利」等重要觀念意涵的變遷作了深入細緻的梳理。他們的〈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、演變及其形態初探〉是這一系列研究的最新成果。這些成果，從研究方法到學理分析，均刷新了以往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。

近代以來，西學東漸是一個不爭的事實，但西學是如何東漸？東漸以後又發生了甚麼相應的變異？內在的理路至今仍是一個待解的謎。金、劉近

年來研究西學東漸後中國近代思想史演化的內在理路，關注思想演化是如何參與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演變和如何受其制約，並致力揭開這一謎團。

西方將「個人」作為現代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、擁有權利和表達權利的主體，這一思想確立於十七世紀前後的英國。但個人主義在西方發展的思想譜系並非是線性的。在法國及俄國，個人主義均意味着個人利益至上，不符合「公意」、「集體」原則，是一個貶義詞；而在德國，則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，表示了對個人主體性和創造性的高度讚揚，甚至具有「超人」色彩。

中國在不同時期對外來觀念的選擇，往往與當時對未來發展模式和理想圖式的追求相關聯。在二十世紀前期，中國大致是先取英美的漸進式改革路徑，後取法俄的激進革命路徑。當然，這種先後又是相對的，即使在整個二十世紀，兩種路徑並非水火不容。以蔣氏政權為例，它實是一個集法俄、英美及中國傳統政治於一體的混合物。就思潮與世風而言，五四可以為界，但就「個人」或某種觀念演變的譜系而言，除了移植，更有與本土觀念的交融及對西方觀念的重構。此外，民眾對西學的認同與接受固然與精英人物的引領有聯繫，但差異亦值得辨析。

閻小波 南京  
2004.9.2

## 消解「台獨」的理念建構

今日台灣島內湧動的一股潮流是建構新的「族群認同」

和「國家認同」。根據薛力〈族群認同——「台獨」的主要動力〉一文的分析，本省人已經成為台灣政治生活的主體，文化意義上的族群認同已經轉化為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認同。經濟發展、自我意識的增強、對自由民主的信仰等等合力作用，致使台灣人要求建立具有「維斯特伐利亞合法性」的國家。

血緣和文化固然是共同體的先天因子，是族群認同的基礎，但後天的因子也可以建構新的認同。台獨份子借助於兩岸中國人客觀上形成的不同歷史體驗與集體記憶，刻意建構其新的認同。李登輝時代一再強調台灣「命運共同體」或「生命共同體」，就是一種有意識的新共同體建構。應該看到，自我的身份與認同必須得到他者的認同才有效，這是「台獨」現在面臨的一大障礙。另一方面。雖然歷史記憶無法改變，但現實經濟的融合與利益的相互依賴、文化與情感的交流是可行的，可以重建兩岸共同體的觀念。我認為，一項極其基礎性的工作是大陸的自由民主化，這是淡化兩岸不同的歷史記憶，消除台灣對大陸的陌生感、恐懼感和疏離感的根本之途。沒有這個基礎，重構仍是危途，看不到希望。就連認同中國文化的龍應台也還是強調，如果大陸依舊非理性，台灣就有獨善其身的權利。北京何以對之？

丁松泉 杭州  
2004.9.1